

研究紀要

二戰前在日客家人相關考察： 以丘念台與東寧學會為中心

范智盈*

大阪大學人間科學研究科研究生

二戰前在日本以丘念台為中心的抗日團體——東寧學會，至今的學術研究多放置於革命團體中解釋，儘管組織成員與領導者皆為客家相關人物，在日本客家的研究並未提及。其原因可推測組織的政治色彩大過於族群特徵，且組織實存時間並不長，因此東寧學會在日本客家史上的位置並不明確。

本文主要以丘念台與在日留學期間所組織的「東寧學會」進行考察，從其形成經緯及組織特徵，檢討二戰前在日客家人的相關活動紀錄，同時辨析以客家籍成員為主的團體與現今以客家認同為主的團體，兩者之間的殊異及可能的關聯。主要目的除了補充二戰前客家人在日本的相關歷史外，也希冀透過東寧學會中的客家成分，為一般學術上對於「客家團體」的考察有所提示。

關鍵字：日本客家、丘念台、客家團體、崇正會

* E-mail: akindo_tlv@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9 月 27 日

A Study on Hakka People in Japa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ases of Qiu Niantai and Dongning Society

Chih Ying Fan**

Ph.D. Student, Global Innovation Kyosei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Sciences Osaka University, Japan

The “Dongning Society” of Qiu Niantai is regarded as a political group in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Although both of the organization’s leaders and members are Hakka, the study of Hakka people in Japan was not mentioned. This article mainly examines Qiu Niantai and “Dongning Society”. From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Dongning Society, we give a review about the Hakka people and their record of activities in Japan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At the same time, we analyze the difference and poss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Hakka and related group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pplement the relevant history of the Hakka people in Japa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We also hope to interpret the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cademic “Hakka group”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Dongning Society.

Keywords: Japanese Hakka, Qiu Niantai, Hakka Gourp, Chong Zheng Association

** Date of Submission: August 7, 2019
Accepted Date: September 27, 2019

一、前言

客家研究至今仍方興未艾，無論是客家的歷史源流、民俗文化、族群意識，社會政策、公共參與等問題都引起各方學者的關注、考察。但每每在探究這些相關的議題同時，卻也始終提問著甚麼是「客家」，或是現今的「客家人」該如何認定與定義。關於「客家」，過去主要依據相同出身地域、血緣關係的共同本質概念，90年代後則進一步提出客家為文化的概念（謝重光 1995），與前者不同是強調客家的互動共生的多元性質。然而關於海外的「客家」，過去主要作為在華僑華人群體中「鄉籍貫別」或「語言幫群」的區分概念，對於「客家」群體的歸屬意識多至 20 世紀後才逐漸明確。那麼探討客家團體的歷史脈絡與形成，除了「團體」本身的經緯背景，成員間共通的出身地域或語言等客家屬性，也作為組織集結的重要元素。本文藉由日本具歷史性的客家團體「東京崇正公會」，從其成立之相關人物丘念台¹作為主要事例對象，試圖考察二戰前在日客家人的相關團體以及辨識客家人群體與客家團體間所存在的空隙。

二、日本客家團體

日本的客家族群，並非像東南亞客家有清楚的客家聚落或會館建

¹ 本刊行文，原則上以正體字「臺」取代異體字「台」。不過，根據維基百科（2019）的資料，丘念台自己的簽名是以「丘念『台』」為表述方式，為了尊重當事人自己的選擇，本文在出現「丘念台」這一名字時是以「台」來表述，而非「臺」，特此註明。

築，在問及日本的客家人時，多半是藉由日本客家社團的引介才有可能找到。長期隱身在日本華人群體中的客家人，大部分的客家人只有在面對對方提及或參與客家人聚會才會主動表明客家的身分（張維安 2015）。過去單一族群身分認同，隨著地理上移動、族群混居、異族通婚等比例上升，客家人較偏向於多重選擇族群身份，且通常是依據著時間、地方與當時情境做身分的表態（客家委員會 2014）。然而對於這類隱性的客家族群，每欲考察日本客家的課題時，大多經由歷史性較長、族群性明顯的客家團體「崇正會」引介進行。

「崇正會」是一在世界各國中的客家團體組織，最初於香港 1921 年成立，其主要原由因 1920 年所出版的世界地理雜誌中，將「客家」比作野蠻部落出身，客家人為駁斥此記述、交涉更正，聯繫北京、上海、廣州等各客屬大同會組織在香港召開客屬大會共策進行，一方面也為敦睦鄉誼、共謀工商業發展及僑居地安定繁榮為目的。作為香港客家社會的指導者李瑞琴，提倡工商業界中多為客家人所組織的崇正工商會——「崇正」兩字，作為香港客家團體「崇正總會」的名稱由來（香港崇正總會 1971）。

在日本最早的崇正會係 1963 年成立的「東京崇正公會」，其主要特徵發起人² 全員為臺灣出身，當時共 80 人出席了位於新宿東京大飯店的召開大會。而後 1965 年名古屋崇正會，1968 年日本關西崇正會，1969 年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橫濱崇正公會，以及 1971 年西日本崇正會等在日本各地相繼成立，並於 1980 年在日本舉辦世界客屬總會第五次懇親大會，集結了世界各地的客家團體，計 1200 人參

2 主要發起人為：李茶珍、彭鶴壽、范添發、戴國輝、劉瑞華、林利章、林政治、謝發榮、張金清、葉雲肖、彭武財、巫開堯、魏湘茂、張熾財等 14 人。

與活動（日本崇正會 1980）。此後，日本另有北海道、東北、九州、沖繩、關東等崇正會成立，但前三組織在 1998 年成立後，僅一年並停止會務。現今（2019）而言，日本仍在活動的崇正會主要是東京、關東、名古屋、日本關西、沖繩等五客家組織。日本崇正會相關年表如下：

表 1 日本崇正會相關年表

年月	事項	備註
1963.4	東京崇正公會成立	李茶珍任第一任會長
1965	名古屋崇正會成立	彭泰源任第一任理事長
1967.9	東京崇正公會使用「留日崇正總會」之名	臺灣民謠歌唱團班來日
1968.3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交替	邱進福任第二任會長
1968.10	關西崇正會成立	邱添壽任第一任會長
1969.6	橫濱崇正公會	陳達對任第一任會長，至 1980 年
1969.10	日本崇正總會成立	范添發任第一任會長
1971	西日本崇正會成立	翁廷政任第一任會長，至 1999 年
1971.9	日本崇正總會會長交替	邱添壽任第二任會長
1973.8	名古屋崇正會理事長改任	李進通任第二任理事長
1975.6	名古屋崇正會改會長制	李進通任第一任會長
1977.3	東京崇正協同組合成立	至 2011 年
1978.4	日本崇正總會「客家之聲」會報發刊	發行人邱添壽，編輯人戴國輝
1980.10	舉辦第五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1997.9	日本崇正總會會長交替	邱進福任第三任會長
1998	北海道崇正會成立	徐達璋任第一任會長，僅一年
	九州崇正會成立	羅宗垚任第一任會長，僅一年
	東北崇正會成立	葉輔治任第一任會長，僅一年
	沖繩崇正會成立	龜島靖任第一任會長
1999.10	日本崇正總會改名「全日本崇正聯合總會」	
	關西崇正會改名「日本關西崇正會」	
2001	日本關西崇正會會長交替	黃達輝任第二任會長
2002.11	全日本崇正聯合總會會長交替	謝坤蘭任第四任會長
2003.2	日本關西崇正會會長改選	謝坤蘭任第三任會長
2006.1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改選	張金清任第三任會長
2007	全日本崇正聯合總會會長交替	陳荊芳任第五任會長
	日本關西崇正會會長改選	陳荊芳任第四任會長
2008.4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改選	劉茂榮任第四任會長
2008.10	東京崇正公會退出全日本崇正聯合總會	

2009.9	日本關東崇正會成立	周子秋任第一任會長
2011.1	全日本崇正會聯合總會婦女部成立	
2012.6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改選	劉得寬任第五任會長
2018.4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改選	劉南強任第六任會長
	日本關西崇正會會長改選	城年德任第五任會長

資料來源：日本崇正會（1980）、周子秋（2015）。

在日本「崇正會」為客家團體的代表組織，但論其成立背景與組織運作皆各為獨立。自東京崇正公會的二任會長（1968~2003）邱進福與日本關西崇正會初任會長（1968~2001）邱添壽任職期間，在香港崇正總會欲辦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鼓吹下，連結各地崇正會再組「日本崇正總會」，並且共同指導每隔兩年交互舉辦會員年度大會。而作為日本客家團體中歷史最悠久之社團「東京崇正公會」，在相關會刊出版物中可發現關於「客家公會」的記述，又作為東京崇正公會的前身。

「客家公會」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10月於東京茗溪會館成立，目的是為解決戰後在日生活續留與歸國等問題，以團結親睦、共謀福利為宗旨。發起人主要以戰前渡日未歸國的臺灣客家菁英，包括余家麟、范子唐、楊春松、林鼎乾、曾永安、李鐵夫、邱紹棠、陳萼芳、賴富貴等人代表（林利章 2005：232）。但客家公會實質持存時間不長，特別是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日本多數華僑團體發表支持新政府的聲明（陳焜旺 2004：267），1950 年起客家公會的核心人物也開始陸續移往中國。³ 客家公會因主要成員先後離開，從 1956 年後組織的會務及活動便陷入停頓狀態。接續 1960 年代後東京客家人再次集

3 楊春松 1950 年度中後任廖承志左右手，主要從事中國僑務關係工作（楊國光 1999）；曾永安 1950 年度中後，主要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委員（安藤彥太郎 1995）；范子唐 1953 年度中參加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後在武漢從事教職工作並創立中日友好協會（劉明惠 1997）。

結，主要可用以下三個原因來說明。

1. 客家公會的主要幹部雖已歸復中國，但會內成員仍在日本且陸續有新的客家人從臺灣赴日。

2. 1950 年中期開始日本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在日客家人在生活及經濟上也得到改善。

3. 作為客家人留日前輩的丘念台，戰後以中華民國資政身分數次來日，開始對海外臺灣人的團體進行遊說與調節。

東京崇正公會在這樣外在條件的催化下，再度凝聚了在日本的客家人，並且與世界性客家組織共同連攜，於 1963 年正式發跡。東京崇正公會秉持著親睦聯誼，經濟合作等目的，將沉靜了幾年的客家公會，將在日本的客家人再次集結，較「客家公會」的不同是明確制訂會則「不分國籍、宗教、政治」的三原則方針，同時也作為日本「崇正會」的相互間的共識。其中，關於丘念台的赴日遊說是本文主要探討的課題，事實上客家公會在 1950 年代開始積極推行「歸國運動」時，丘念台於 1951 年赴日時的集會已開始使用「崇正公會」之名，參與者其中包括余家麟（周子秋，2015：13），本文雖未能確認集會成員是否同為「客家公會」，但當時丘念台以擔任國民政府重要資政以及作為留日的客籍前輩身分赴日，對在日臺灣人或是在日客家人有一定的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下節針對丘念台的生平背景及思想特質進行檢討，特別留意是丘念台在日留學期間所組織的「東寧學會」。

三、丘念台與客家

丘念台為丘逢甲之子，原名丘琮，1894年出生於臺中潭子大埔厝，祖籍在廣東嘉應州鎮平縣（蕉嶺），家族移居臺灣五世，謂客家族系。丘念台的父親丘逢甲為清代臺灣仕紳，生於苗栗銅鑼，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曾與唐景崧組織「臺灣民主國」抗日，但終告失敗後便攜帶家眷與部屬三四十人逃亡內渡廣東。但儘管抗日失敗仍心繫臺灣，故將長子丘琮取別號「念台」，冀其繼承父志，完成復臺宏願（丘念台 1962）。丘念台 1913 年渡日後進入東京成城中學的留學預備學校，隔年考取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理工部，成為廣東省留日公費生，在一高預科讀滿一年後即被分派至日本石川縣金澤的第四高等學校就讀。1919 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物理科就讀，隔年再轉工學部（丘念台 1962：79-101）。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1917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歐洲的民主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思想高漲，與其伴隨的多民族國家或是殖民地民族自決主義的抬頭，這股思想風潮影響著臺灣人、朝鮮人及其他殖民地民族，也促使著民族覺醒（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73：23）。1919 年朝鮮發生獨立運動，1921 年臺灣本島也發起民族運動，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形同對外界的一個窗口，不斷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主張，成為臺灣民族運動的指導團體，如「聲應會」、「啟發會」，以及林獻堂所指導的「新民會」等，皆是當時在東京以臺灣留學生為中心的團體（蔡培火 1979：75-81）。當時丘念台也受中國國民革命及社會民主、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進入東京帝大之後，經常於高田馬場附近的三橋館，與臺灣及中國留學生會面談論政治革命，而後便私下組織了「東寧學會」（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73：933）。

關於「東寧學會」丘念台在自傳中提到，在他進入東京帝大不久，便開始進行聯繫在日本的臺灣籍學生。當時因丘念台不懂閩南語，所以第一步聯絡對象為客家籍的臺灣青年，其次才是閩南的臺灣青年。關於學會運作從聯絡感情到學術研究，如指導臺籍生閱讀祖國（中國）課本，學習中國語言，鼓勵前往中國工作，以及分析中國政局與革命發展趨勢。最大的目標是想在潛移默化中使他們的滋長光復臺灣的自決與希望。但東寧學會在日本的管制下，只能暗中探詢研討，不敢有公開的活動（丘念台 1962：99-100）。

1923 年丘念台於東京帝大畢業後，仍持續與東京留學中「廣東種族」臺灣人以政治研究之名奔走於組織，而後才將組織正式定名為「東寧學會」，其發起人包括：「李祺（支那人、法學士）、彭逢聯（中壢、立正大學）、徐榮錦（苗栗、早大聽講生）、邱濶洪（新竹、早大專門部）、吳鴻爐（中壢、中央大學）、蔡景洪（新竹、名教中學）、張阿華（竹南、早大預科）、陳漢秋（苗栗、東京帝大）、李添春（旗山、曹洞宗大學）、林明達」等 16 名，會員以中國及臺灣等廣東種族留學生等在日住民為主要。學會組織目的訂定為漢文研究及北京官話練習、研討政治問題等，彭逢聯、徐榮錦、邱濶洪為會則制定與會員募集實行委員，李祺為顧問（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73：934）。在這些成員中除了李祺為嘉應州出身與林明達外，皆為臺灣赴日留學的客家青年，而後也作為臺籍客屬青年的革命運動成員（曾彩金 2001：173-174）。

然而，東寧學會因 1923 年東京大地震導致會員離散，為復興組織 1924 年於東神田中華民國青年會館集會，並正式制定會則。根據警察沿革誌的紀錄中，東寧學會表面雖以親睦團體、學術研究為目的，實質

上是丘念台利用其集會宣傳、煽動殖民地獨立運動、臺灣復歸中國領土等主張（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73：935）。事實上 1925 年丘念台回到廣東後，東寧學會之後的運作無從得知，在臺灣民族運動史上的紀錄中，「東寧學會」因為語言的限制和目的特殊的關係，除少數的各家留學生外，一般臺灣留學生知道有這麼一個團體的人似乎不多（蔡培火 1979：97）。但在臺灣 1926 年臺灣文化協會與東京臺灣青年團夏季巡迴演講中，可見在廣東語（客家話）班的演講者包括徐榮錦、邱潤洪等人（蕭新煌、黃世明 2001：185）。而後，隨東京留學生團體的勢力漸增開始出現對立的團體，在中國情勢變化左翼思想的影響下，東寧學會因臺灣的左翼運動，1934 年 20 名會員在臺被檢舉，其中 15 名被起訴，1935 年因罪證不足被判無罪（蕭新煌、黃世明 2001：158）。儘管東寧學會消失後，丘念台回到廣東後仍持續抗日運動，且其組織成員仍以臺灣客家人為主。

1925 年丘念台回到廣東後仍汲汲於對日抗戰與光復臺灣的工作，在從事礦產調查同時也集結當地的臺灣籍住民成立「臺灣華僑同鄉會」。1930 年時任職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期間，在校內所設立的「臺灣華僑補習部」，其教育內容組織的會章，教育內容近同於在日本時的組織主要目的為光復臺灣。從 1930 年 11 月名簿來看，又以新竹、苗栗、中壢為居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73：936-937）。在他自傳中則提到，臺灣省政府委員翁鈴、苗栗縣縣長劉定國、中華日報南部版經理李德松，皆是華僑補習班的學生（丘念台 1962：130）。而後 1938 年創辦了「東區服務隊」號召各地熱心抗日的知識青年，後來被視為共產黨外圍組織，也被迫解散（何來美 2017：97-98）。但在其基礎上，丘念台無論是在

日留學期間或返回廣東，與臺灣人都持續保有密切關係，特別是作為「廣東種族」的臺灣客家人，這也為國民政府移臺後，在丘念台的政治力有臺灣人的支持。

1943年發表了《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隨著日本放棄臺灣、澎湖，國民政府開始著手進行收復臺灣。1944年國民政府成立了「臺灣調查委員會」，丘念台擔任其委員，協助國民政府投身於復臺規劃（林德政 2014）。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多利用府下的臺灣籍民委且兼為有中國經驗的半山，⁴作為統治機關與臺灣社會的橋樑，而當時丘念台則是作為半山客家係屬的領導人，其他還包括劉兼善、黃國書、徐言鄒清之、鄒滌等人。彼等均以客家人關係連繫密切互相標榜，而形成唯一（客家）派系（陳明通 1993：247）。

1945年丘念台擔任監察委員，1946年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1947年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1950年再受聘於總統府資政。1951年丘念台戰後初次再回到日本，主要目的為了遊說主張「國際託管」和「臺灣獨立」的臺僑改變立場（林正慧 2015：398）。往返日本的期間，丘念台多與在臺僑商人和留學生聯繫以加強在日臺僑與國內的關係，並組織「旅日臺胞觀光團」、「中日親善訪問團」，在臺僑青年間也設立講習會等（丘念台 1962：320-323）。而晚年主要在日本協助客家僑胞成立「東京崇正公會」，加強海內外的客家交流（何來美 2017：28），根據東京崇正公會的相關文獻中，元老會長邱進福提到，戰後的日本社會無論社團組織或活動集會都容易引來特務警察的質問與

4 「半山」係指在日本統治時期前往中國大陸尋求發展，在行動上擁護國民政府，並在戰後跟隨國民政府返臺的臺籍人士。由於具有中國經驗，被認為是半個「唐山人」，故又稱為半山（李筱峰 2008）。

關切，除了范子唐與余家麟等華僑菁英集結也稱不上正式的客家組織外，在日本幾乎沒有客家人的社團。而東京崇正公會的成立是因為 1962 年丘念台來日，集合了李合珠等人鼓吹客家人團結，提倡組織客家團體，在各處有力人士的支持下隔年東京崇正公會因而誕生（邱進福 1996：72）。

在客家公會活動年表中則記錄著 1958 年、1960 年客家前輩丘念台先生蒞臨指導，於華僑大廈萬壽閣舉辦（東京崇正公會 2001：4）。之後，丘念台來日報告臺灣時事類似的歡迎懇親會也經常舉行（林利章 2005：232）。其中，1963 年丘念台參與「東京崇正公會」的活動見到了仍在東大就讀博士班的戴國輝，當時在蔣經國「崔臺青」的政策下，丘念台的工作是安撫留學生，遊說他們回臺服務。後來丘念台到日本時，並經常與戴國輝見面，戴國輝也藉此對丘念台做訪問，理解國民黨裡頭非常複雜的派系（張鈞凱 2012）。這樣的臺日往返，直到 1967 年丘念台病逝於東京青山地鐵，享年 74 歲。

回顧丘念台的一生，從小繼承父志，以抗日救國光復臺灣為要務。之於客家，如同他在自傳最初所述，牢記客家祖先因外寇侵陵而輾轉南遷的歷史，無論落腳何處都必修勤耕苦學，奮發圖強。現在一般的客家族人，普遍具有勤儉進取的精神，可都說是在傳統生活中陶鍊而成的（丘念台 1962：5）。透過丘念台所持的客家精神或說強化作為客家人應有的意識，對於當時共處時空環境中，集結持有共同背景，面對相同問題的成員可說有其一定的影響力。從最初東寧學會的成員來看，在他所提到了人物中，兩位翁氏為北部桃園人，蕭秀利為六堆佳冬人，其後發起人也是以桃竹苗地區客語人士為主要，「語言」在其中所產生是目標理

念相互疏通的作用。雖然無法確認成員間彼此對於「客家」的認同，但確定的是不同背景的客語人士，共同語言是當時有助丘念台所指導的團體能夠連成一氣的主要關鍵。

即便在日本的警察沿革誌中，也將丘念台指導的團體標記為「廣東種族」為主要成員的組織，而丘念台本身則說明因語言的關係，在組織東寧學會時客家籍青年是首先聯絡的對象。成員間的共通語言是作為讓成員集結、團體擴張的重要因素。藉由「語言」跨越了臺灣或廣東出身的省籍區分，更可作為當時想像共同體的族群意識凝結，而這樣的藉由「語言」去集結當時客家人的組織，與過去華僑同鄉會館組織最大的差異，是當時社會背景與其指導人欲以傳遞的理念與目標，牽引著我們對於組織類型的定位，卻也忽略其組織成員間相互共通性如何形成及作用。下節透過客家團體的主要類型如地緣團體、血緣團體、親睦團體，檢討其團體概念的由來，同時分析與丘念台相關團體之定位。

四、再考客家團體

過去在華僑社會中，「客家」主要作為人群分類的概念，究其「客家」是為地域籍貫分類的標誌，其二依據鄉音方言，也用來指稱使用客方言的群體。然而關於「客家人」的團體組織，在這樣的集合要素下又再發展各自的團體目標、認同意識、以及團體行為等。本節主要透過客家團體的分類下，針對丘念台所集結客家人的相關組織進一步作分析與說明，也藉以論述在「客家團體」形成前，客家人群體可能的原貌。

（一）同鄉組織

在海外的華人群體中，當客家作為地域或地理上的分類時，首先必須瞭解的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分布區域。羅香林（1933）曾依行政區域將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臺灣劃分了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⁵在海外客家同鄉大多是以這些客家族群所在地之地緣關係所連結而成的團體組織，以崇正總會的相關社團名錄為例，如：嘉應五屬（梅縣、蕉嶺、五華、興寧、平遠）；潮州大埔、豐順；福建永定、上杭、汀洲；惠州府十縣（惠陽、博羅、龍川、河源、紫金、海豐、陸豐、和平、連平、新豐）等所集結而成同鄉會團體中，其成員以客家人為居多，作為客家同鄉會，也調客屬社團。

而過去丘念台所組織的同鄉會團體，雖主要以「華僑」或「臺灣」為名，但究其成員也都是以臺灣客家分布主要所在地（中壢、新竹、苗栗、六堆）之地緣關係所集結而成。若進一步探討丘念台廣東蕉嶺的祖籍背景，蕉嶺客家移臺的歷史早始於清康熙年間，即便經歷了日本統治時期，戰後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蕉嶺客家也不在少數。而後 1954 年在臺灣所成立的蕉嶺同鄉會，則是以地緣關係連結臺灣本外省客家的客家組織象徵。這些以客家地域所表示的組織團體，其後都被歸為客屬團體之一，也得以說明，「客家」事實上是具備跨地緣的連結性，儘管過去丘念台並非以「客家」為名組織其相關團體，卻仍主要集結以「客籍地緣」關係的成員。

5 江西省純客住縣市：尋烏、安遠、定南、龍南、虔南、信豐、南康、大庾、崇義、上猶等縣市。福建省純客住縣：寧化、長汀、上杭、武平、永定等縣。廣東省純客住縣市：梅縣、興寧、五華、平遠、蕉嶺、大埔、豐順、和平、龍川、紫金、河源、連平、始興、英德、翁源、仁化、赤溪等縣。廣西、湖南、四川、臺灣沒有純客住縣，惟非純客住縣為主（羅香林 1981：94-97）。

(二) 語言幫群

移居海外之華人所組成的團體，多以出身地的原籍地名冠之，藉組織成員來自同一個地區的地緣關係，聯絡鄉誼、互助慰藉以及發展相互的經濟利益。但除了以地緣關係所集結的團體組織外，還包括以共同語言所凝聚成員的幫群，如客家幫、福建幫、廣東幫、潮州幫、海南幫等。這樣的方言群體，不受血緣、出身、地域等因素限制，特別是以客方言為組織的團體又可作為跨地域的語言幫群，後以「客屬」、「崇正」作為標示，同時連結、涵蓋了上述客家族群分布所在地區使用客方言的人群。

然而，海外的客方言人群藉由語言的共通性，易於將地緣組織再聯合，如同屬客家語系統的福建汀州永定的客家人，傾向參與嘉應客家會館或大埔客家會館，而非與福建閩南語縣的會館聯合，地緣組織的這種聯合趨向，最終形成華人社會中的幫群（蔡佩蓉 2002），而客家幫也作為華人團體組織中方言群體、語言幫群的代表。藉著組織中語言所產生的作用，無論是在集結、運作、疏通、發展上都發揮相當的效能，又可說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在社會、文化、心理的功能上也標示著各自的背景、信念與歸屬。那麼再思考丘念台所組織以「客籍地緣」為主要成員的團體時，當中不可忽視的便是其共同的客家語言強化著彼此之間關係，同時也建構著相互間的群體認同。

(三) 文化群體

客家在作為地理籍貫、鄉音方言的區別外，依謝重光（1995）所提

出的文化概念，也可窺見客家也轉型著以文化符號作為與其他團體的區別，其中又包含客家歷史、客家語言、客家意識、客家人物等。丘念台所組織的客家人團體，在其明確的抗日救國與光復臺灣的理念下，當時「客家」在組織中僅表示的是鄉籍、是語言，也可能說是精神上代表。而藉由戰後日本崇正會成立得以說明客家人如何轉化為對「客 / 客家」的群體認同。

東京崇正公會的成立，一方面有作為客籍前輩丘念台的鼓吹外，進一步去探究崇正會的經緯，又可說是海外的客家華僑逐漸顯示出對「客」稱認同的轉變。事實上崇正會與過去丘念台所組織政治色彩濃厚的相關團體有極大差異。但隨著崇正總會的成立，強調了客家中原南遷為漢族末裔的歷史、客家語言仍保留中原古音的特殊性，以及客家人在歷史上盡忠愛國的表現，至現代南洋客家華僑的成功等。這些都可作為將「客家」視為自我肯定或足以自豪的識別標籤，這樣的「客家」意識也加強著離散在外的客方言人群，開始產生對於「客家」的認同。藉參與崇正會來產生對客家認同與發揮自我肯定的作用，故將此「客家」作為文化符號來思考，是對於客家認同而集結成的文化群體。

綜上所述客家團體分類的基本要素，試論證日本的客家團體。過去文獻中，關於日本最早的客家人組織，多指向位於橫濱二戰前的「人和會」。在日本崇正會《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特刊》中則記載，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我旅居橫濱華僑多為客家人，並組織人和會，其中以惠陽、寶安兩縣者居多，因此又有惠安公所組織。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華僑罹難者中客家人也大有人死亡，而今橫濱中華義莊，尚有惠安公所豎立之震災紀念碑，此為我客屬縣僑在橫濱留下史蹟（楊隆生 1980：

3)。關於橫濱的客屬同鄉究竟多少不得考察，但自清末時孫中山在橫濱先後組織興中會分會與中國革命同盟會分會乃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參與，確實也說明著 20 世紀初橫濱與客籍人士始有密切關係。

再者，針對惠陽及寶安兩縣，在羅香林（1981）關於客家分布的註記中，廣州的惠陽多為本地屬人，但操本地話者人數無多，操客話者多在各鄉，區域較闊，普通粵人稱惠州話者，實指客話。而寶安又為舊新安縣（現深圳）為非純客住縣。可以發現的是，無論純客縣或非純客縣，大體上都能兼操客語。那麼除了就其出身原籍外，以客方言群體來看組織的話，事實上與客家人相關之團體所涵蓋的範圍應屬廣泛，特別是在過去的革命社會背景下，與現今所持有的「客家」認同歸屬實質上無法同語，那麼「客家人團體」或「客家團體」，在兩者間需要更明確的概念定義。

若將使用客方言的群體或客家地緣關係成員可作為「客家團體」說明的話，在學術研究中弔詭的是，對於丘念台所組織的「東寧學會」，卻未曾放進日本客家團體的討論範圍，或說過去對於日本客家相關歷史文獻中也幾乎隻字未提。被作為日治時期民族革命團體的東寧學會，事實上以丘念台政治理念為中心的組織方針，與戰後積極推動華僑歸國運動的客家公會也不無相似。姑且不論組織團體類型，以集結的要素及發揮的效能來說，無論是東寧學會或與丘念台相關的團體，在其客家地緣或客方言在組織中都具備其重要作用，探討以客籍成員或客方言者為主要的團體，在華人華僑團體中也被視為客家人的組織，這是未來在探究「客家團體」時有必要進一步釐清的概念。

本文藉由考察丘念台的背景與其集結的團體組織，亟欲說明的是，

在「客家」尚未成為文化符號前，與客家人的相關團體可能是同鄉組織也是語言幫群。至今我們仍無法就其團體的類型或組織的目的來辨認是否為「客家團體」，但因為有集結客家籍、客方言的成員結構條件，才有可提升、強化相互間的共同性，進而產生對「客家」的認同，或可說是客家人群轉向客家團體必要的過程。

五、結語

本文主要藉由日本客家代表團體「崇正會」中，與東京崇正公會成立相關人物丘念台進行考察。以抗日救國光復臺灣為志向的丘念台，即使其所指導的組織是具政治性的革命團體，但在丘念台的客家背景與過去往返臺灣、廣州、日本的經歷，在當時共有的社會經驗及共處的社會背景中，易於連結相同具客家地緣與客家語系特性的組織成員。雖然無法將組織成員的群體認同，視同於現今對於客家族群的歸屬，但「客家」在成員相互間所展現的作用力是鄉音也是鄉情，也才有可能去傳達、發揮共同組織的目的。過去「客家」所指稱的是地緣也是方言，對於這類以客家地緣或使用客方言所集結的相關團體組織，在考察「客家團體」時應有明確的定義與位置。

關於客家的問題，常常始於「甚麼是客家」，然而對於「客 / 客家」的指稱卻也不斷的在轉變。與現今對於客家團體的概念，往往是在「客家」已作為民系與族群名稱後所延伸的群體表象，我們探查其歷史、發展、特色、網絡化等，但對於團體本質上的「客家」卻欠缺討論，這導致無從辨別何謂客家，也無法了解客家為何。本文藉由客家的概念，重

新思考客家團體的本質，冀以對過去客家人的組織有更大的思考延展與認識。

參考文獻

- 日本崇正總會，1980，《世界客屬第五次親大會紀念特刊》。日本：日本崇正總會。
- 丘念台，1962，《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社。
- 安藤彥太郎，1995，《虹の墓標：私の日中關係史》。東京：勁草書房。
- 何來美，2017，《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臺北：聯經。
- 李筱峰，2008，〈半山〉。頁 82-83，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
- 周子秋，2015，《日本客家述略》。臺北：日本關東崇正會。
- 東京崇正公會，2001，《東京客家》。東京：東京崇正公會。
- 林利章，2005，〈東京崇正公会のあゆみ〉。《客家与多元文化》2：231-234。
- 林德政，2014，《客籍大老丘念台與戰後臺灣歷史之研究》。客委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書。
- 邱秀芷，2010，〈永遠的赤子：丘念台先生(上)〉。《統訊》20-25。
- 邱進福，1996，〈日本における客家と崇正公会〉。《アジア文化》21：72-83。
- 客家委員會，2014，《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臺北：客家委員會。

- 香港崇正總會編，1971，《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出版部。
- 張鈞凱，2012，〈林憲：低調的愛國者〉。《海峽評論》253(1)：56-59。
- 張維安等，2015，《東瀛客縱：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臺北：客家委員會。
- 陳明通，1993，〈派系政治與陳儀治臺論〉。頁 223-302，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陳焜旺，2004，《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日本：日本僑報社。
- 曾彩金，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歷史源流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 楊國光，1999，《ある臺灣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東京：露滿堂。
- 楊隆生，1980，〈客家人東渡日本史〉。頁 3，收錄於日本崇正總會，《世界客屬第五次親大會紀念特刊》。日本：日本崇正總會。
- 瑞徵，1998，〈愛國客籍老人丘念台在日本〉。《アジア文化》23：174-178。
- 維基百科，2019，〈丘念台〉。《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3月24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8%E5%BF%B5%E5%8F%B0>，取用日期：2019年10月29日。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73，《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
- 劉明惠，1997，〈拳拳赤子情：記臺胞念范子唐先生〉。《武漢文史資料》3：61-63。

謝重光，1995，《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蔡佩蓉，2002，《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八方文化。

蔡培火，1979，《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學海。

羅香林，1981，《客家研究導論》。臺北：眾文。

